

## 華人比美國人更寬容？「寄艙」和「痔瘡」

余創豪 Chong Ho Yu (Alex)

[chonghoyu@gmail.com](mailto:chonghoyu@gmail.com)

最近，我在台灣參觀了錢穆故居，錢穆是一生致力維護傳統中國文化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儒家大師，他生於一八九五年，於一九九零年逝世，現在其故居變成了博物館。導遊向訪客播出一段錢先生的演講錄音，他的普通話發音不標準，導賞員問我能否理解他說的話，我慚愧地搖搖頭，當時還有另外兩名台灣遊客在場，導遊問她們同樣的問題，但她們也表示無法分辨出錢穆說什麼。我感覺好多了，說國語的人亦無法明白，那麼我這個香港人又怎麼可能聽得懂呢？

我跟一位已經在台灣生活了很多年的香港移民交談過，他告訴我，當他在大學讀書時，他無法理解一位鄉音很重的教授說什麼，連一句也跟不上。起初他以為這是自己的問題，但後來他發現他的台灣同學也面對同樣的困難。

從某種意義上說，台灣，新加坡，以及其他一些華人社會可能會比美國更具寬容精神，這是因為即使所有華人都用普通話，但各省各地的口音是非常不同的，這現實促使人們不得不去用心地聆聽別人。有人會說，講英語的人也有不同的地方口音，英國英語、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等的發音是有差異的，即使在美國，南北口音也有點不同，但無論如何，如果他們仔細聽，通常他們能夠理解大部分的英文內容。然而，來自不同省份的華人可能不會理解對方大部份的國語，有時甚至一個單句也聽不到。換句話說，普通話的多樣性超過了英語。

結果是，許多華人習慣了聽不同的口音，人們已經見怪不怪。最近在桃園機場我有兩件行李需要托運，香港人稱「托運」為「寄艙」，我告訴櫃檯服務小姐：「我有兩個寄艙。」講出來後，我意識到不妥，因為我好像說「我有兩個痔瘡。」櫃檯服務員沒有訕笑，她只是禮貌地幫我處理行李。

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沒有汽車代步，在大學基督徒團契的聚會結束後，我需要找有車的朋友送我回家，我想問一位說國語的女子她的車子是否還有空位，但我的普通話發音變成了：「你有沒有胸圍？」她笑著糾正我的發音：「不是胸圍，是空位。」跟著她開車送我一程。

如前所述，國語人對此抱著「見怪不怪，其怪自敗」的態度，但很多美國人則不然，我在美國已經生活了許多年，在我經驗中，不少美國人聽到「不純正」的英語時，會表現

出一副不耐煩的模樣，甚至出言侮辱，例如很多年前一個白種女孩聽不到我說什麼的時候，她傲慢地說：「將來我一定不會嫁中國人。」（在那時候我沒有追求她）很多時候美國人會模仿外國人的口音來嘲弄人，我在美國大學教書，有一個同事是韓國人，她有一個美國學生竟然在課堂上模仿教授的口音來作為笑柄。但直到目前為止，沒有國語人模仿我的香港口音來戲弄我，我也未聽聞過說普通話的學生膽敢在上課時取笑香港教授的國語發音。

我不是浪漫化台灣人的包容態度，曾幾何時，台灣當局也要求人講純正的國語，日本於 1945 年戰敗，中華民國開始在台灣執政，跟著去日本化和國語化運動在台灣如火如荼地展開，日本佔領台灣四十二年後才廢止中文，但台灣省長陳儀在語文上卻採用鐵腕政策，回歸一年便廢除報紙雜誌的日文版，許多激烈的措施令台灣人反感，最後爆發了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在同一年三月蔣經國在檢討事件時向蔣中正報告，事件之最大原因是語言不通。之後台灣當局的國語化政策更變本加厲，台灣作家侯文詠說，年少時若他不說國語，他的老師便罵他是背棄中國文化的千古罪人。但自二十世紀九零年代起，台灣的本土意識抬頭，於是台灣社會開始尊重多樣性。

標準化和多樣化各有優點和缺點，沒有英語作為國際語言，今天不同國家進行溝通便不容易；不用官話作為華人的標準語言，華人未必有很強的身份認同，不同省份者之間的溝通亦會有困難。然而，設立一個標準之後，有些人便會抱持唯我獨尊的心態，瞧不起說話不像自己一樣的人。在我看來，標準化僅是為了方便，數學公理蘊藏著真理，但所謂語言的標準跟真理無關，發音只是約定俗成。在歷史上北京的口音被設置為標準，但若果廣東口音被採納為標準，那麼歷史便會完全改寫，說不定「寄艙」的正確發音會是「痔瘡」，「空位」的標準發音變成了「胸圍」。

2014.7.4